

4月號我們推出紀念三位剛辭世的二十世紀思想家的專欄，引起讀者關注。從讀者來信中可以看到，人們不斷地追思他們，表明他們不僅在上個世紀，而且在今後仍然對我們的思想、學術有着巨大影響。

4月號「全球經濟展望與國情分析」的一組文章，對中國當下的改革提出另一種思路，有讀者來信對個別觀點表達不同意見。如何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適當平衡各利益階層之間的資源分配，這是一個難題。政府如果動員全社會資源去「實現最大目標」，不見得就能把事情辦好。

我們願意傾聽各種不同聲音，並希望有更多讀者來信參與評議。

——編者

中國政府應該有最大目標嗎？

胡鞍鋼雖居廟堂而不忘憂民，〈加入WTO後的中國農業和農民〉一文發人深省。但本人深省之餘，也有一絲疑慮，一個政府最大的目標到底是甚麼？

中國這50年來最要命的問題之一就是總有一個「最大的目標」在起作用。建國初，「盡快工業化」（甚至重工業化）是最大的目標，後來以「反修防修」階級鬥爭為綱，政治是最大的目標，再後來「效率優先」的經濟增長成了最大目標。現在胡鞍鋼又為政府提出新的最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大目標，即他明確向政府所建議的「中國政府最大的發展目標是使八億農民廣為受益，最大的公共投資受益者應是八億農民」。如果政府接受胡的建議，動員全社會的資源來實現這個目標的話，恐怕會誤盡天下蒼生。

政府沒有也不應該有最大的或最優先的目標，海耶克說：「集體主義制度有兩個主要特徵，擁有一個目標體系與由此產生的道德體系。但這種道德體系不讓良心自由運用它自己的規則，一切以組織的目標體系為衡量標準，有助於實現組織目標的手段都是正確的。為組織的利益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哪裏存在着一個凌駕於一切的共同目標，哪裏就沒有任何道德或規則的容身之地。對一個社會的共同目標的追求，可以無限制地忽略任何個人的任何權利和價值。」

政府無權為了三億城市人口而犧牲八億農民的利益，也無權為了八億農民的利益而犧牲三億城市人口的利益，甚至也無權為了13億國民而有意犧牲法律賦予一個公民的神聖權利。

中國現在需要的是一個目標多元化的、盡可能中立的、不代表任何人的法治政府。實

際上，農民最怕也最恨的就是處處以救世主面目出現、號稱代表他們利益而實際上視他們為芻狗的那些人。許多問題不是WTO帶來的，WTO對農民來說難道不是個機會嗎？農民也不是一個同一均質的群體，具體問題還要具體分析。WTO之類的文章可以休矣。

還是到黃河邊、淮河邊、長江邊和草原上走一走，和「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一起談談「林村的故事」，靠年鑒是解決不了甚麼問題的。

李剛 南京

2002.6.18

哲人的人文化成

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不過，有人的死輕於鴻毛小於砂礫，有人的死則重於泰山大於巨礫。只有那些有功於人類的傑出人物的死才能贏得隆重莊嚴的儀式。

法國的布迪厄、美國的諾齊克與德國的伽達默爾終於走完了各自奇異的文化旅程，幸福而永遠地投向了另一個世界。《二十一世紀》4月號也不惜闢出專欄，對這三位二十世紀著名哲學家的學術成就表達

敬意。其中，潘德榮的〈伽達默爾的哲學遺產〉一文引起我的興趣。

潘先生從總體上把握住了伽氏哲學的精神本質，指出伽達默爾哲學的生命力在於「直接追溯到人們最原初的生活經驗，而不是在純粹的思辯領域中來構建自己的哲學體系」。這個哲學體系就是通常所說的「哲學詮釋學」。柏拉圖對話論、黑格爾辯證法與海德格爾本體論是這個體系的三大基石。這三大基石立於實踐的融合為伽達默爾把傳統意義上的「理解」擴展到「廣義對話」層面提供了學理條件，這樣，「理解觀」成功地轉化為「對話論（大理解論）」，對話又必以傾聽為前提。這無疑是伽氏的一個理論發現或一份哲學遺產。正因為「理解」被提昇為「廣義對話」，主體與對象（主觀與客觀或主與賓）才得以從不平等地位轉渡到平等地位，反過來說，只有對話雙方處於平等地位，對話才可能真正進行並順利完成。這是一場人類理解行為的認識論轉向。在伽氏詮釋學的指引下，主體與對象在主觀理解與客觀理解中產生了互動式交流而達到融合境界（地平融合）。可以說，伽達默爾所持守的主體—對象平等意識和文化對話論，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偉大理念。這種理念，對我們今天如何正確而深入理解古今中外文化關係、民族關係、國家關係、信仰關係、政治關係、經濟關係、外交關係等領域，具有巨大的啟發意義。僅此而言，伽達默爾就足以永垂不朽。

伽氏一生的全部努力都在

於化古典成現代，化陳腐成神奇，化經驗成智慧，化自然成精神，化天象成人文。因此，他值得我們這樣紀念，並且應當擁有哲學事業的接班人。

于奇智 廣州

2002.6.27

有勇氣堅守我們的精神家園

貴刊清醒地意識到守護「文化」的歷史使命，它總是在有意無意之間反覆提出那些具有永恆意義的共同話題，潛移默化、潤物無聲地影響着我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2002年4月號的「人文天地」一欄推出的伽達默爾、布迪厄、諾齊克生平與思想傳略，和「讀書：評論與思考」一欄中的單世聯的文章，所探討的一個中心問題是「學術」、「知識份子」與「人生」的應然關係。聯繫到近幾年來國內學界頻頻爆出的種種醜聞，我相信這個話題的再次提出絕不是無的放矢。

布迪厄通過研究提出「知識份子也是普通人」的命題，是就當下絕大多數知識份子的思想和行為的自然生態而言的。這並不意味着他對「知識份子」沒有理想的預期。他的這個命題的積極意義是要人們（包括知識份子自身）警惕知識份子的自我神化傾向。不過，布迪厄等優秀知識份子也在以其自身的言論和行動表明，真正的「科學知識份子」畢竟是有別於普通民眾的。同時也有別於「政界精英」和「商界精英」。由這裏提到的三位賢哲，我們不難聯想到，古今中外，許多知識份子得到社會的高度尊

敬。這往往並不是因為他們具有顯赫的事功（如中國人之崇拜秦王漢武唐宗宋祖然），也不是因為他們憑機敏和時運積攢了大量的金錢財富（如今日許多中國青少年之崇拜比爾·蓋茨然），也不是因為他們的學術觀點和具體主張無可爭辯，「放之四海而皆準」，而是由於他們卓越的人格風範。這種人格風範主要體現為：第一，有沒有表達和捍衛自己真實思想的勇氣；第二，有沒有身體力行自己主張的毅力和恆心；第三，有沒有坦率承認自己謬誤的寬廣襟懷。尼采說：「上帝死了！」我們當然不再期待自己成為「上帝」。但我們也不應該因為無法成為「上帝」和「先知」，就放棄了改造自己的努力，抱一種「我是普通人我怕誰」的態度。先賢的人格風範依然是我們努力的方向。至少，也要做到「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吧。

確實，當下國內的學術生態環境是不利於人文精神生發和保持的。雖然近二十多年來「振興科技」、「科教興國」的口號可謂如雷貫耳，但言者和聽者的思想意識中，「科學」、「教育」概念似乎並不包含「人文科學」和「人文精神」在內。

正因為如此，我們更迫切地希望能夠經常的、不斷的從貴刊讀到那些恬淡、雋永、睿智的文字，使我們的心靈得到些撫慰，使我們有勇氣堅守精神的家園。

董國強 南京

2002.6.22